# 再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胡用琼,刘玉芳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追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渊源,思想开明的晚清官僚认识到语言变革之必要,表现了官方对白话的认同与策略,西方传教士欧式语法、语词的输入补充了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资源,晚清的农民运动用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甚至把提倡白话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他们都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先行作了强有力的铺垫,表现了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合力支撑。

[关键词] 晚清; 言说主体; 白话文运动; 农民运动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3-0100-06

1898 年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发表,标志着晚清白话文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是晚清知识分子中较早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的语言变革主张。他直接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指出白话有八大益处:"省日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1]与此同时,梁启超的新文体,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文学主张,以及各地兴起的白话报,把晚清白话文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台阶,使白话承担着启蒙与自强的时代使命。可见,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政治危机和民族危难下兴起的语言变革运动,它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了蓄势,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与铺垫。近年来,学术界研究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现象、成就及其表现,对晚清白话文运动进行了得失判断。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晚清的农民运动、传教士的翻译以及晚清官僚对白话的提倡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的关联却鲜少提及。因为此,本文试从以上三个维度探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 一

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文言成为人们书写的范式,而后人只能在范式内表情达意。与此相对的是白话,即来自底层民众的生活语言,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引车卖酱者之流"的语言,主要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下层人民的交流中。书面交流使用的一种语言,口语表达使用的却是另一种语言,这就造成了言和文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堡垒随着封建统治而逐渐森严,并成为封建文化、等级制度的体现。

文言推崇的是尊古复古,讲究语言的继承性。正如传教士丁韪良指出文言教育的缺陷在于:文字代表一切,而科学没有丝毫地位,人们把精力花在提高文字功夫而不是研究事物,重视继承而忽视创造力[2]。传教士发现文言的继承性其实指的是文言尊古复古性,这种语言一旦遇到外来冲击,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鸦片战争后文言无法应对新的需求就是实证。晚清比较开明的士大夫如曾国藩、左宗棠、魏源、李鸿章、奕訢等都提出了学习外语,补充文言之不足。晚清开明士大夫在开展洋务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文言与西方语言难于沟通带来很大障

[收稿日期] 2016-01-20
[作者简介] 胡用琼(1979-),女,湖北利川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碍,如奕訢在《通筹善后章程折》:“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3]3晚清采取措施鼓励人民学习外国文字并对精通者以优奖和委以重任:“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3]4甚至晚清掌握实权的重臣李鸿章也极力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他在《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中指出:“目前准总理衙门来咨,遵议设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为同文馆等。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根实诚伪,而后有称物乎施之效。”[3]173“臣拟请上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馆,选近郡年十四一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果有精通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3]175李鸿章认识到器物变革与语言变革的关联性,可以说封建统治阶级开明人士语言观的转向来自于洋务运动实践和中西语言对照下的差异性启示。同治帝也亲自颁定谕书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为同文馆,当经照所议行,该衙门已行知该将军等遵照矣。”[3]6洋务运动以来,设立同文馆、各省设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在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里说:“诸学皆徒习西学、西语、西文。”[3]33可见,晚清统治阶级对西方语言文字的关注、提倡打破了文言作为官方语言的独尊地位,同时西方语言的词汇、语法,西方书籍的翻译也正是在官方对西文与西学的提倡中大量涌入,一定程度上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用白话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提供了合法性的途经,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代表官方的语言策略,远远大于民间立场的革新。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开明人士要求突破文言的限制外,晚清被派到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直接体验了西方文化,他们认识到西方的富强来自于民智大开,从而呼吁启迪民众。他们首先从革新语言文字入手,承认文言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和文化载体的长处的同时,也发现文言的弊端,言文分离和文言的难学与难写,如梁启超发表《论幼学》批评汉字难学:“西人每岁创新法,制机器者,以十万计;著新书,得新理者,以万计‘而中国无一焉。……西人之文,以声为主,故字虽多而识字易;中国之文,以行为主,故字虽少而识字难。”晚清知识分子批评了文言的言文分离,难学难识,正好抓住文言的切要之处,他们对文言的批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晚清开明的统治者、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方面主动认识到语言与自强的关系,提出学习西方语言;另一方面从启蒙的立场提倡白话文,普及文字,而这种语言策略影响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展,晚清白话文运动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层面上来展开的。

## 二

晚清农民运动在革命过程中推行白话文以利于政策的上传下达,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忽略了晚清农民运动的白话文实践到底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怎样的语境与资源的探讨。

在封建社会,使用白话的主体主要是底层民众,由于文言的难学难识,他们大多被排斥在文言的门槛之外,也被排斥在权力话语之外。晚清史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把语言诉求与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为了配合革命的宗旨,在语言上反对文言,提倡白话。晚清农民运动的语言主张与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截然有别,晚清代表官方的语言变革“只是在‘用’的层面上来讨论白话文的意义,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体’仍是古朴典雅的文言。”[4]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语言策略是把反对文言与反对封建统治联系在一起,如洪仁玕在《资政新篇》里“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5]62而浮夸、堆砌辞藻等文病恰好是文言的通病。他们在反对文言的基础上抵制封建文化,“反对文言经典如儒学经书,捣毁庙宇、偶像、查禁孔孟妖书”等活动[5]202。天平天国即定都南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公开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势必要否定一切封建制度,建立起一个新的统治思想体系。这样,儒学传统将会遭受到更加严重的浩劫,太平天国进一步把经书宣布为妖书,严禁军民习诵和收藏。以致发出严令:“凡一切妖书如有做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5]232天平天国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申明:“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5]313由此可见,一旦言说白话的话语主体取得政权,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废除文言并给白话赋予合法化地位。天平天国运动是第一个真正扛起反文言,提倡白话的革命团体,虽然他们只是在实践层面提出一些反文言、反传统的措施,没有提供理论上的支撑,不足以与牢固的文言话语系统相抗衡,而且包括洪秀全,洪仁玕之内

的领导人受儒学思想影响,在反抗传统提倡白话的主张时呈现出动摇状况。但是他们的文化政策对文言产生了冲击,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用白话传播新思想对抗封建堡垒文言的斗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晚清腐朽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激起农民的不满,于是清朝末年再次爆发了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宗旨"扶清灭洋",把帝国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传教势力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底层,主要是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在革命过程中采用的语言策略必然与革命成员的构成有着极大的关联。"晚清白话文的兴起缘自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变法自强的强烈呼声中,出于开启民智的考虑,新知识者始把白话纳入了关注的视野。"[4]演说、报纸、白话书籍、白话教科书等等都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表现形式。义和团运动发生于晚清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义和团运动的成员构成决定了革命运动的语言策略,也决定了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策略的区别。胡适早在1922 年就曾作出这样的断言:"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只是出于对下层民众进行启蒙的需要才力倡白话,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仍是文言,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只有到了五四时期,这种局面才得以完全改观,白话文终于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形式。"[6]胡适的言下之意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根本上没有动摇文言的根基,而义和团运动的革命动机和革命方式动摇了文言赖以存在的根基,由于他们的成员构成主要是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而这些都是言说白话语言的主体,相反文言对他们来说显得"高深难解",因而他们在宣传革命主张和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和手工业者时,必然采用所熟悉的语言方式—白话语言,不存在像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先知启蒙者"我们"与被启蒙者"他们"的区别。义和团运动就是用熟悉的白话语言宣传革命,其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来自官方形式的揭贴、告白,也有适合革命宣传的传单、咒言、歌谣形式,这些革命宣传的语言几乎都是来自底层地地道道的白话。如义和团一则告白"修铁路、架电报,制造洋枪洋炮,机器工艺,尤为其乖戾指天性所好,奉机车、气球、电灯为上品。"[7]51有的告白甚至以通俗的民谣形式号召人们"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7]37。义和团的歌谣非常口语化,把民间口语几乎是民众的日常用语直接用于革命宣传中:"……义和团红灯照,音乐会吹灯,音乐会法器响,好似天兵降九霄。哈哈笑,笑哈哈,义和团能上法。哈哈笑,笑哈哈,义和团能吹灯。上法吹灯,吹打上法,一定要把洋人打垮。"[8]"……几段青烟。透大清。黄旗几个。到西东。一段黄沙。耀眼明。八面威风。追鬼叫。一身铁胆闹江东。可笑可笑不用问。就知道。黑阻路。白当道。众神惊。诸神叫。披金甲。云雾消。洪(红)灯照。三五七八就知到。那是你看。可笑不可笑。"[9]义和团的革命歌谣的宣传形式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革命圣地得到了遥远的呼应。除了告白、歌谣、民间口碑以外,义和团为了吸引大量的团民,散布了大量浅显通畅的揭帖:如

"四海风云架海潮,争权争教又争朝。
西风未尽南风起,兵火相连野火烧。
天下各省谁为主,满天星斗与孽妖。
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
还我江山还我劝,刀山火海爷敢钻。
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10]29-30。

这些揭帖形式上采用七言诗歌形式,句尾还押韵,每句字数相等,运用了白话表达了新思想、新事物,文字朴实。在天津,义和团散布的揭贴遍及大街小巷。诸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天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兵法艺都学会,要平鬼子不费难。折铁路、拔电杆,紧急毁坏火轮船。"[10]29-30

同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在革命形式上,也用白话公布布告、公文、诏旨、兵册、馆街名册和家册。义和团农民运动在语言上的革命诉求,虽然不像太平天国那样有明确的纲领,并进一步提出反对儒学,提倡朴实简易的文风,但是义和团在使用白话的程度上比天平天国更加口语化。义和团领导阶层不像太平天国起义者那样把反对文言与批判儒学经书联系在一起,并有意地使用白话挑战文言的权威。义和团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底层农民和手工业者,即使后来成员纷杂,他们的话语方式决定了其口语化的语言策略。这一点正好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相反,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起者饱读经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洪秀全是在科举取士多次失意后回家乡发起农民运动,洪仁玕在香港居住多年,对西学

有很多见识。所以他们宣传革命所选择的语言就形成了“我们”与“你们”的区别,与晚清开明地主和知识分子的语言策略相似,虽把白话作为一种革命的工具,但内心认可的还是文言。如洪秀全自己一边禁儒书,一边私下看经书著作,看完立即烧掉,而动员民众参加革命和宣传革命纲领时采用白话的布告、公文等,这种注重语言转换的革命形式与义和团相似,但义和团的发起者直接来自底层民众,他们在进行政策宣传与动员时,白话化程度和形式比天平天国更加彻底,几乎找不到文言的踪影。比如义和团的揭贴、布告、书信、碑文以及坛谕、团规、戒条等等几乎都采用老百姓的口头语言,甚至直接采用民众的歌谣形式进行宣传,起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这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统治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发现白话简单易懂,在宣扬政策方面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于是他们也采用白话歌谣来推行自己的政策。如袁世凯为了分化瓦解义和团,就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仿效曾国藩、罗泽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通过官吏、乡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宣讲生,直接向群众进行劝导,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他还广贴告示,奖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主民团……。可见,晚清农民运动把白话作为革命宣传与发展的工具,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谣宣传革命方针政策,它的朴实易懂简单的文风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启蒙民众的语言诉求不谋而合。只不过是这种语言主张随着革命的失败并没有席卷全国形成全面影响。

## 三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不可忽视外来因素的影响。外来因素主要是传教士、翻译文学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欧式白话和语法的传入,构成了现代白话的主要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传教士对汉语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11]。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借助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活动的范围和权力逐渐加大,他们在宣传西方宗教的同时,发现最大的困难就是文化的冲突和语言的障碍。正如上海清心书院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回忆,他来华之初传教“苦于风土人情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12]11 为了有利于传教,“他们广泛开展新闻、出版、教育和社会改革活动。”[12]17 其中办学是传教士最重要的辅助宣道的手段,他们兴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同时把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提出:“教育不能灌输教条应把知识和能力相结合。”[12]96 教会学校的兴办冲击了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和儒学经书的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言接受的广泛性。由于西方传教士传教主要集中在下层民众,为了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教会学校为下层民众和妇女打开了接受知识的大门,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高墙壁垒。另一方面,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建立了强大的出版机构,以编译西书,翻译介绍了西方科技、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学说,以及宗教神学,最早把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进化论,特别是宇宙进化论和生物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西学的需要。传教士介绍西学,兴办学校,改革教育体制,办报纸,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晚清白话文运动不相关联,实质上这些措施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当两种文化相遇时,首先是在语言产生上生出同化过程。比如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文化,引入了大量的欧化的词语,特别是光、电、气、地球等等全新概念,在引入欧化词语基础上,还引入西语的语法,改变了文言的语句逻辑结构,这些都对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文言语言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从实践层面上看,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学校,语言方面的课程占了很大的比重,曾有一份教会学校的课表如下:

首年:认字写书、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各国简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利、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12]149。

这是教会学校九年制的教学课表。从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年教会人们学会认字是入学的首要条件,显然把语言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几乎每年都要学习翻译,还要学语法,而语法是欧化白话最重要的语言特征。教会学校比较重视语言教育,激起了人们对西语学习的热情。如 1883 年 10 月 25 日《申报》以《论西人渐染浮嚣之习为题载》写到华人学习西语的热情:

“上海为通商大埠,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其制造灵巧不能学,乃学其浅近者,效其语言,……。”[13]221

晚清的翻译促进了欧式白话的形成与输入。晚清翻译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传教士和晚清知识分

子的翻译。翻译首先要找到两种语言语意相对应的语词。由于中西长期隔绝,文化迥异,如何在中国语言文化中寻找相类似的概念、范畴和术语来恰当地表述西方异质文化,这对于晚清长期以来的以尊古复古的文言书面语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也是相当困难的问题。比如"传教士翻译《圣经》是对 God 一词应做"天主"、"上帝"还是"神"就曾有过激烈争论。"[13]100翻译产生的词语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寻找相类似的概念和术语,就像上面我们所说 God 一词译作上帝就是根据中国的天人观念而来,寻找相似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就是直译,在中国语言文字里无法找到类似的词,就直接引入了这些新词语,这些词语融入到欧化的白话中,大多数是属于自然科学的术语,他们构成了欧化白话的主要来源。比如翻译西方书籍产生了一些新的词语,比如"《代数学》与《代微积拾级》的翻译发行不仅向中国学者介绍了符号代数与微积分分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在中国数学史上创立起许多新概念、新名词、新符号。……其中如代数学、系数、根、多项式、共程式、常数、变数、自变数、……。"[13]169这些新词语创造得很贴切,并且沿用到现在。晚清翻译中这样类似的新词语还有很多,主要表现在化学、物理和医学,还有哲学领域里,比如坦克、大炮、自行车、火车、化学各元素的词语等等。再如"哲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原来的译名并不固定,有心理学、心灵学、理学、心智之学等多种译法。20 世纪初,哲学一词使用增多,才逐渐固定下来。"[13]183可见,翻译创造的新词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要符合各自语言文字的文化习惯。这些新词语构成了现代白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白话的重要体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长谈》中指出:"白话文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是国语的现代化。"[14]

当然晚清传教士翻译也有局限性,他们翻译的著作大多是传教士口译,再由国人笔述,所以翻译的语句还是按照文言的文法来翻译的,只是在其中夹杂了一些新词语。下面我们摘取一段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衡芳笔述的《地学浅释》的翻译:

"地球全体均为土石之质凝结而成,人若未常深求其故,以为尚能察究金某石之所在或浅或深已足以致用矣。及细考之而知地质时有变化及其变化之故有关生物者,则不得不再究其鸟兽鱼草木之种类以为识别。如是究源竟委,遂成地理一家。"[15]

由于译书与笔述分开,导致了传教士翻译文学里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新词语、新思想、新事物里夹杂着文言语法结构。那么作为晚清饱学西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撰写著作和翻译西方书籍时也是在文言语法基础上翻译的。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后,又陆续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翻译的著作是在文言句法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以至于人们读不懂他的著作,严复自己在《群己劝界论》的凡例里曾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皆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16]这是因为古文不能翻译外国近代文学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严复在这里所说的原书之难一是文言里无法找到与之意义相似的新词语,二是文言结构无法表达复杂的文句。但是他们译书中的新词语、新思想、新事物以及偶尔夹杂的欧式语法深深影响了晚清白话文运动。

我们探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发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可以从官方的立场和民间的立场进行梳理。但是我们发现,晚清封建统治者、传教士把白话作为工具性语言,农民运动把反文言倡白话与反封建当作并行的政治策略来推行,截然对立的阶层与个体对白话的支持态度亦是晚清白话文运动获得普遍支持的重要历史原因,当然传教士欧式语法,新词语的输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词,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的合力支撑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发生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M]//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76-18.

[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23.

[3] 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4] 王 平.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认同意识"困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1):3-4.

[5] 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6] 胡 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胡适文集:第 3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2.

[7] 陈郑江,程 敏.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M].济南:济南齐鲁书社,1980.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廊坊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工作委员会.廊坊文史资料:第 4 辑[C].1992:47
[9] 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1-2.
[10] 杨呈胜.最后的呐喊-义和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1] 袁 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8.
[1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3] 戴鞍钢.晚清史[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14] 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M].桂林:广西漓江出版社,1991:34.
[15] 华衡芳.地学浅释:卷 1[M].1873:1
[16] 刘运峰.1917-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

## The Occurrence of Vernacular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 Yong-qiong, LIU Yu-f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of late Qing Dynasty wa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in the political crisis and the national crisis. We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the Open-minded bureaucratic awared the need to change the language, which is the official identity and strategy of the vernacular; The input of the missionaries' western grammar, and the word supplement the resources of the modern vernacular language. The peasant movement of late Qing Dynasty promote the vernacular from the thought, the revolutionary action, and to promote the vernacular and anti feudalism together. They made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Vernacular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ere support force of The official position and the folk position on 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movement.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peech subject; vernacular movement; peasant movement